

西部开发与人文学术丛书

宋元时期的老学与理学

刘固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元时期的老学与理学/刘固盛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2

ISBN 7—224—06017—8

I. 宋… II. 刘… III. ①老子—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宋代 ②老子—哲学思想—研究—中国—元代 ③理学—研究—中国—宋代 ④理学—研究—中国—元代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4746 号

宋元时期的老学与理学

刘固盛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蓝田县立新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4 插页 200 千字

2001 年 3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224—06017—8/B·174

定价:18.00 元

总 序

我们在古都西安筹划人文学术研究丛书事宜,正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和起动之际,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促进了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组稿、改稿、定稿等一系列工作。这里所说“鼓励”并不是抽象的,而有着具体实在的思想内容。在我们的理解中,我国西部大开发,经济建设无疑应当是中心课题,而人民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此相联系的教育、文化、科学的开拓和发展也是不可或缺的,应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文化和科学中,研究“人”自身以及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人的思想、人的感情等等被称之为“人文科学”,即通常所说的文学、历史、哲学、语言、艺术等人文学科是不能忽视的,这些和人的整体素质的提高,以及与经济建设都有内在的紧密联系。道理显而易见: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由“人”创造的,因而对于“人”自身的研究,并使人在精神世界方面感到充实,具有高尚的理想和情趣,并遵奉道德规范等人文科学就不是可有可无的了。

我国西部有不少优秀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就西北地区而言他们大多集中在西安、兰州,而在敦煌、西宁、银川、乌鲁木齐等地也有人文学者群。西部地区的人文学术研究者基本是在高等学校的研究机构或文化、文物行政机构工作,他们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在敦煌学、历史地理学、中国思想史、周秦汉唐历史学、中国考古学、民族史、语言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中已有不少研究成

果；其中有些已经出版，有些正准备出版。在这样的机缘中，我和一些年轻的人文学者决定组织编辑、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拟分若干辑先后出版。其中既有与西部开发有关的研究内容，也有没有直接关系而属于人文科学普遍问题的研究。总之，出版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是为了繁荣我国人文学术研究而贡献一点力量。

西部开发人文学术研究丛书的出版，得到陕西省人民政府和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支持，在这里我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张岂之

2000年2月13日于

西安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目 录

导言	(1)
一、经典解释与中国古代思想学术	(1)
二、老子与老学	(5)
三、宋元老学的特点	(11)
四、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	(19)
第一章 唐代老学中的理学“因子”	(22)
一、重玄之境	(23)
二、“道者,虚通之妙理”	(28)
三、心性原则	(32)
四、“孔老之术不相悖”	(39)
第二章 北宋道教学者解《老》的时代精神	(53)
一、陈抟学派与重玄余绪	(54)
二、《道德真经藏室纂微篇》	(64)
三、张伯端的老学思想	(88)
第三章 北宋儒家学派的《老子》诠释与性命之学	(102)
一、王安石学派的老子研究	(103)
二、司马光论《老子》	(113)
三、苏辙以“复性”解《老》	(117)
四、“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老学主题	(128)
第四章 北宋老学与二程理学	(133)

一、洛学渊源	(134)
二、道理心性之间	(141)
第五章 南宋金元老学的流变	(170)
一、理学繁兴	(171)
二、老学的新发展	(175)
第六章 理学家的老子研究	(183)
一、朱熹对老子的看法	(183)
二、林希逸的老学思想	(206)
三、吴澄以“理”解《老》	(219)
第七章 道教老学中的性理旨趣(一)	(229)
一、“天人一理,了无间然”	(230)
二、玄经原旨及其理学倾向	(241)
三、张嗣成援“理”入《老》	(248)
第八章 道教老学中的性理旨趣(二)	(254)
一、全真道老学微旨	(255)
二、白玉蟾的“即心即道”	(259)
三、“有无交入,性命双全”	(269)
余论	(278)
主要参考文献	(280)
后记	(289)

导 言

一、经典解释与中国古代思想学术

对经典进行理解并加以诠释,这是东西方文化发展过程中共同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而在中国,这一现象尤为显著。中华民族是一个尊崇文化传统和重视历史经验的民族,经典作为历史文化与传统思想的载体,自然受到了人们的普遍崇奉。崇奉经典不仅是出于思想信仰的需要,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目的,那就是为了在新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利用经典。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除了语言文字方面的疏隔以外,经典的内容也不可能永远适应各种变化了的时代要求,于是,具有沟通和协调作用的经典注释便成为了人们的必然选择。学者们往往根据不同时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形势变化,对经典作出新的诠释,并将自己的思想学说融贯其中,以满足时代的需要。这种借古经以阐新说的现象,既是汉代以来我国经典解释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学术发展的重要特点。张岂之先生曾指出:“中国思想史重经学形式,许多思想家托圣人而立言,通过注解经书来阐述自

己的思想,很少独立地发表自己的见解。”^① 这是非常准确的总结,儒学的发展是这样,道家思想的衍化也不例外。

确实,中国古代思想学术的发展是与经典的诠释密切相关的。那么,什么是诠释呢?按照传统的理解,诠释就是详细地解释,以阐明事理。成中英先生则从哲学的高度下了一个定义:“诠释是就已有的文化与语言的意义系统作出具有新义新境的说明与理解,它是意义的推陈出新,是以人为中心,结合新的时空环境与主观感知展现出来的理解、认知与评价。”^② 关于诠释的这一定义,我们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把握:其一,诠释的效果是理解。诠释者可以面对历史、面对现在、面对未来,作出陈述与发言,表现出其心灵的创造力,并启发他人的想像力,体会新义,此即为理解。其二,从道的角度看,诠释不在于把握所有的真理或常道,而在于体现道的本体的活力与创造性,在于以有限提示无限,以有言提示无言,以已知提示未知,进而促进道的理解和体会。成中英先生从本体层面所进行的这些阐发,亦可以为我国古代经典注释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既然诠释体现着诠释者心灵的创造力,是“意义的推陈出新”,那么,我们衡量经典注释价值大小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它是否在经典原有内容的基础上,做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创新。

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是特别注意在经典的注释中发挥其独创性的,中国的思想学术也正是依赖经典的这些创造性解释,才不断地向前推进,并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思想学术高峰。两汉

① 《中国思想史·序》,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② 《从真理与方法到本体与诠释》,见《本体与诠释》,三联书店 2000 年版。

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等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思潮的兴起与发展,无不与经典解释内容与方法的创新密切相关。

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即是对儒家经典的一次重新阐释。汉武帝时,社会经过战乱以后重新获得了统一与繁荣,但当时“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①,于是,统一思想并为大一统的君主专制政治提供理论上的依据,成为了一个时代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②,大一统的文化精神是天地之间不变的原则,古今共通的义理。基于这种认识,董仲舒悉心钻研《春秋公羊传》,撰写《春秋繁露》,并依照“《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③的理路,对《春秋》的“微言大义”进行了重新阐释。在阐释中,他吸收阴阳名法思想,把阴阳五行学说和灾异符命说与儒学结合起来,从而创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神学体系,适应了汉代封建统一国家的需要。相对于孔孟来说,董仲舒在儒家经典解释中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已具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精神,或者说,董仲舒的解释是儒学为了顺应时代的需要而进行的一次内部创新。自此以后,儒家经典受到空前的尊崇,经学成为了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而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

魏晋之际,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和董仲舒“天人感应”神学的崩溃,人们又面临着一个思想信仰重建的问题,于是,玄学应

① 《汉书·董仲舒传》。

② 《汉书·董仲舒传》。

③ 《春秋繁露·精华》。

时而生。正始玄学的代表王弼选择了《周易》、《论语》、《老子》三部传统经典作为解释的对象,运用“辨名析理”和“得意忘言”的解释方法,在旧典里融进新的理念和精神,通过本末、体用、一多、动静等互相对应的范畴,建立起了一套形而上的玄学本体论哲学体系。当然,王弼对经典的解释,并没有在“以无为本”这一抽象命题前就此却步,而是进一步将这个高度抽象出来的“无”又设法返回到具体的“有”之中去,使抽象与具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便为现实政治服务。为此,他在注释中提出了“名教出于自然”的著名命题,从而调和了名教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并从哲学的高度论证了现存社会制度的合理性。王弼以“得意忘言”的方法注解经典,不仅显示出了新的时代精神,而且为经典的阐释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到了宋代,自中唐韩愈开始倡导的儒学复兴运动继续发展,并最终导致了理学的形成。思想家们以儒学为本位,援佛入儒,引道入儒,将佛道二教的本体论、认识论与儒家学说中的政治伦理哲学结合起来,从“天理”的高度去证明封建伦理纲常的合理性与神圣性,把个体的道德践履和心性超越交织在一起,从而适应了封建中央集权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一体化统治的要求。理学的创建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解释与阐发。程颢说:“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①这个“体贴”实际上代表着对儒家经典的一种新的理解和创造。不惟“天理”,理学的基本范畴如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信、忠信、忠恕、诚、敬、恭敬、道、理、德、太极、皇极、

^① 《二程外书》卷12。

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等条目^①，虽然都出自于儒家经典，但只有经过理学家们的重新阐发以后，才获得了全新的哲学价值和时代意义。理学家的这种创造性工作，再次证明了经典解释与思想学术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不同时代的学者总能够从经典的解释中开创出新的思想，这固然是受时代的影响，出于现实的需要，但也与经典本身的特点有关。我国古代的经典大都言简意赅，思想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因而具备广阔的解释空间，诚如金岳霖先生所云：“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结果是千百年来人们不断地加以注解，加以诠释。”^② 这里道出了经典解释总是能够获得新的活力、不断发展的另一个原因。

二、老子与老学

《老子》，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和道家经典之一，虽然字数不过五千，却拥有一个博大精深、玄奥无比的思想理论体系，其内容涉及到自然、社会、人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一直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与儒家经典一样，历代都有人从不同的角度对《老子》加以诠释笺注，阐发玄旨，到元代时，“道德八十一章，注者三千余家”^③。自元以后，重新注释《老子》的人，更难计其数，由此构成了一个极其赅博浩繁的《老子》注释系统，

① 参陈淳《北溪性理字义》。

② 《中国哲学》，载《哲学研究》1985年第9期。

③ 杜道坚：《道德玄经原旨》张与材序。

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老学。

由于老子之道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多义性和抽象模糊性，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者，都可以对《老子》进行主旨不同的解释。赵志坚云：

以文属身，节解之意也；飞炼上药，丹经之祖也；远说虚无，王弼之类也；以事明理，孙登之辈也；存诸法象，阴阳之流也；安存戒亡，韩非之喻也；溺心灭质，严遵之博也；加文取悟，儒学之宗也。^①

杜光庭则总结得更加具体全面：

道德尊经，包含众义，指归意趣，随有君宗。河上公、严君平皆明理国之道，松灵仙人、魏代孙登、梁朝陶隐居、南齐顾欢皆明理身之道，苻坚时罗什、后赵图澄、梁武帝、梁道士窦略皆明事理因果之道，梁朝道士孟智周、臧玄静、陈朝道士诸粲、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何晏、钟会、杜元凯、王辅嗣、张嗣、羊祐、卢氏、刘仁会皆明虚极无为理家理国之道，此明注解之人，意不同也。又诸家禀学立宗不同，严君平以虚玄为宗，顾欢以无为为宗，孟智周、臧玄静以道德为宗，梁武帝以非有非无为宗，孙登以重玄为宗。^②

宋元之际的杜道坚更从时代的高度加以概括：

① 《道德真经疏义》卷6。

② 《道德真经广圣义》卷5。

道与世降,时有不同,注者多随时代所尚,各自其成心而师之。故汉人注者为“汉老子”,晋人注者为“晋老子”,唐人、宋人注者为“唐老子”、“宋老子”。^①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老子”,每一个注释研究者也有其各自所理解的“老子”,这是老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最大特征。因此,韩非、严遵、王弼、孙登、梁武帝、顾欢、孟智周、成玄英、李荣……历代注家总能从《老子》中解读出不同的宗趣,阐发出不同的新义,从而保证了老学发展的长盛不衰。对此,熊铁基先生总结说:“这如此众多的‘老子’与作为原典的《老子》之间,可以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有继承,又有发展。而正是这种联系与区别、继承与发展的长久交织、演进,组成了老学发展的历史,且赋予了它极为丰富的内容。”^②

为什么不同时代会有不同的“老子”呢?除了到我国经典解释的一贯传统中寻找答案以外,西方现代诠释学理论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启发。海德格尔说:

把某某东西作为某某东西加以解释,这在本质上是
通过先行具有、先行视见与先行掌握来起作用的。
解释从来不是对先行给定的东西所作的无前提的把握。
准确的经典注疏可以拿来当作解释的一种特殊的具体化,
它固然喜欢援引“有典可稽”的东西,然而最先的“有典可稽”
的东西,原不过是解释者的不言而喻、无可争议的先入之见。
任何解释工作之初都必然有这种

① 《玄经原旨发挥》卷下。

② 《中国老学史·前言》,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

先入之见,它作为随着解释就已经“设定了的”东西是先行给定的,这就是说,是在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和先行掌握中先行给定的。^①

海德格尔认为,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依赖于理解者和解释者的“前理解”,而“前理解”状态由三个方面构成:一是“先行具有”。解释者在开始理解和解释之前,实际上已经存在于某种历史和文化之中,社会文化背景、传统思想观念、知识结构、风俗习惯等等因素作为“领会之占有”,都会影响着他。二是“先行视见”。同先行具有一样,先行视见也是在解释之前就已预先存在的,“解释向来奠基在先行视见之中,它瞄着某种可解释状态,拿在先有中摄到的东西‘开刀’。被领会的东西保持在先有中,并且‘先见’地被瞄准了,它通过解释上升为概念”^②。三是“先行掌握”。指解释者在解释和理解之前已事先具有的某种前提和倾向,“解释一向已经断然地或有所保留地决定好了对某种概念方式表示赞同”^③。先行具有、先行视见、先行掌握所构成的“前理解”,是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一切解释只能在“前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加达默尔秉承了海德格尔的思想,并认为“前理解”有两种形式,即我们得以进行理解的真前见和我们由之而产生误解的假前见,解释者无需丢弃他内心已有的前见解,而只要明确地考察他内心所有的前见解的正当性。加达默尔进而强调:“一切诠释学条件中最首要的条件总是前理解,这种前理解来自于与

① 《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76 页。

② 《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76 页。

③ 《存在与时间》,三联书店 1999 年版,第 176 页。

同一事情相关联的存在。正是这种前理解规定了什么可以作为统一的意义被实现,并从而规定了对完全性的先把握的应用。”^①而在具体的解释活动中,“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②。

海德格尔和加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告诉我们,“前理解”既是解释的关键,但也正是它,造成了解释者和原作者之间的一种难以消除的差异,其结果便是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和解释历史流传下来的经典,这即是说,解释者对经典进行解释时,总是在个人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传统观念、民族心理、风俗习惯、知识经验、思维特点等基础上展开他的解释,任何经典的解释都会不可避免地带有解释者的主观色彩和时代烙印。这一观点对我国经典注释的研究包括对《老子》注释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说明经典的注释中总是包含了注释者本人的独特理解,而这种理解又往往反映出注释者的创造性贡献。于是,我们便不难明白中国古代经典注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为什么总能够推陈出新、不断演进,以及在老学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有“汉老子”、“晋老子”、“唐老子”、“宋老子”之区别。

的确,一部老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各个时代的学者们根据政治、道德、思想领域的时代变化,不断地对《老子》作出创造性解释的历史。因此,老学不仅自身形成了一个十分浩繁博大的学术系统,而且跟中国文化史、中国思想学术史的发展密切相关。老学是与汉代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的发展交融共进的,它与儒、道、释三家的关系盘根错节,十分复

① 《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② 《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杂。那么,我们研究历史上不同时期的老学发展情况,不仅可以发现作注者对《老子》本身的领会与掌握程度,还可以看出作注者本人的思想,进而考察一定历史时期某些哲学思潮的特点和哲学理论的衍化情况以及思想文化的发展规律。老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与思想文化发展的一面镜子。

老学在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然而,有关老学的研究却被长期忽视了,而基本上成为思想学术史上的一片空白。20世纪90年代以前,仅有零星论述,如王明先生较早论及了老学发展的时代特色:“《老子》为古道书,辞义精蕴。自来诠注,各随时代风尚,敷衍一家言。”^①他作《老子河上公章句考》,提出自西汉初迄三国,老学盛行凡三变,其宗旨各有不同:“(1)西汉初年,以黄老为政术,主治国经世。(2)东汉 中叶以下至东汉末年,以黄老为长生之道术,主治身养性。(3)三国之时,习老者既不在治国经民,亦不为治身养性,大率为虚无自然之玄论。”^②注意到《老子》注之宗旨每随时代风尚而变化,这是十分正确的见解,“老学三变”的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另一位对《老子》注研究有贡献的学者是蒙文通先生,他说:“以儒家言之,秦汉至于明清二千余年,学术之变亦多,派别亦复纷歧,然决未有一派之中曾无人注六经者,于注经之家即足见各派之宗旨,于《经义考》求之,一部经学史略具于是也。至于道教,何独不然,未有一派之中而无人注《道德经》者,于此

① 《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

② 《道家与道教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93页。

考之,而道教思想之源流派别发展变化亦略具于是也。”^① 提出从《老子》注亦即老学的角度来研究道教哲学的发展衍变,给人以很大启发。同时,蒙文通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校辑唐代成玄英《老子义疏》及李荣《老子注》,率先提出道教哲学中存在一个“重玄”学派,并撰《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录》一文,对“重玄”的源流与旨趣作了初步梳理与考证,从而为以后有关重玄学的研究提供了先导。

学术界真正对《老子》注的重视,乃始于20世纪90年代。在一些关于《老子》的学术讨论会上,许多学者如朱伯崱、钟肇鹏、熊铁基等先生都一再呼吁要加强“中国老学史”的研究,对历代解《老》的著述,应该加以清理和总结,其目的有二:“一是提示老学历史的和逻辑的发展进程,从而了解老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二是有助于理解《老子》思想的本来面貌,清洗后人对老子的种种解释,正本而清源。”^② 为了适应这种学术发展的需要,熊铁基、马良怀、刘韶军先生合撰了《中国老学史》一书,该书作为我国研究老学发展的第一部系统专门之作,是道家文化与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收获,它总结了中国老学从秦汉直到明清两千余年间的发展历史与基本规律,为老学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三、宋元老学的特点

从老学发展的历史看,宋元时期是一个高峰,“上自帝王卿

① 《道教史琐谈》,《中国哲学》第四辑。

② 朱伯崱:《重新评估老学——关于深入研究老子思想的几点意见》,载《老子与中华文明》,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